

21世纪年度小说选

2006
中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I247.5

179

:2006

2007

21世纪年度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6 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编选.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
ISBN 978-7-02-005933-1

I .2… II .人…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0909 号

责任编辑:刘 稚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印制:周小滨

2006 中篇小说

2006 Zhong Pian Xiao Shuo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83 千字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张 20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5933-1

定价 32.00 元

出版说明

我社自 1977 年起,即每年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两种年选曾经深得读者的喜爱,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1994 年后,这项工作一度中断。21 世纪肇始,根据文学界人士和读者的建议,我社决定恢复中、短篇小说年选的编选和出版工作,以便及时总结年度中、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绩,向读者集中推荐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也为新世纪的文学积累做出我们的贡献。

恢复出版的中、短篇小说年选总冠名为《21 世纪年度小说选》,以示我们一百年不动摇,长期做下去的决心。《21 世纪年度小说选》分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编一册,于次年元月出版;编选范围为当年全国各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入选篇目的排列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21 世纪年度小说选》的编选工作得到许多著名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的支持和帮助,他们应我社之邀,对当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状况进行深入、广泛的研讨,提出许多极有价值的选目。我们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充分参考专家们的意见,严格进行编选。在此,谨向诸位专家深表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1	我的姓氏,父亲的帽子	赵 刚
35	预言	查可欣
87	门前一棵槐	何存中
114	猴有一个梦想	杨少衡
170	心爱的树	蒋 韵
214	巡逻记	李约热
252	我的叔叔余乐	盛 琼
283	一朵棉花	肖克凡
328	命案高悬	胡学文
388	八个家	王新军
451	锈锄头	乔 叶
484	奸细	罗伟章
544	仿佛依稀	金仁顺
582	教案	莫怀戚

● 赵 刚

我的姓氏,父亲的帽子

——为一个不存在年代的记忆

全家回城后父亲就唠叨开村子里的谁谁谁借了他两瓶酒,谁谁谁借了他半袋米,谁谁谁欠他多少钱。酒和米也就算了,一听有人欠我们的钱妈妈不干了,就发火,说别人欠你钱怎么不早说?现在回南京了再说有个屁用!父亲看着她摇头,扭头朝我们无声地张了张嘴,从口型上判断他说的是两个字,泼妇。我们三个人就一起笑——爸爸总是能轻易地让家里的人快乐起来的。我说的我们三个人是我和我的两个弟妹,这一年弟弟十二岁,妹妹八岁,我十五岁。爸爸从此在生活中养成了唠叨的习惯,一逮着机会就说谁谁欠他什么什么,每次妈妈听到他说这事就着急,忍不住要数落他,只要妈妈一张嘴爸爸便不吭声了,但是只要妈妈一停下来,隔不了多久爸爸就会旧话重提,我们甚至觉得爸爸是故意以此来激怒妈妈的,因为我并不认为真的有人欠我们家什么,那么他为什么要一再声称别人欠他的钱呢?他是什么意思?他究竟想干什么?

父 亲

生活中父亲与帽子的关系更为密切。自我有记忆以来他头上一年四季都是戴着帽子的。他常戴的是一顶低檐的棕色皮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人时下巴便相应地抬高，冷峻的神色与百无聊赖的情绪混杂，他将此理解为“傲慢”。这已经是一个颇为古典的词汇了，现在的孩子管这个词叫“酷”。其中当然有故作和刻意的成分，一种故作姿态的刻意，是浅薄的时代与某个人之间的一个玩笑，但是父亲自己却浑然不觉。四十岁的时候他走在南京的大街上，下巴抬得很高，双手斜插在裤袋中，遇到年轻的异性时眼神便迅速加温，脸上的神情则愈显冷峻。这时父亲才真正开始在生活中觉悟，生活与他的玩笑就此展开。走在大街上的父亲刻意要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流氓的模样，却忽略了流氓其实是有着青春的时限的；他大半生是在军营中度过，即使是在后来的乡村生活中，他也总觉得自己依然延续着军人的属性，是暂时脱下军服的军人。等意识到一个城市流氓比一个称职的军人更能让自己快乐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早过了可以成就梦想的时段，此时再努力，他在城市中的最好结果至多是个无赖，无论如何都到不了（城市）流氓的境界了。

年轻时的黑白照片上，父亲着军服的时候不多，平时一身便装，戴一顶棕色帽子——黑白照片上突兀的棕色——你信吗？

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爸爸和弟弟妹妹三个人正围在桌子前写写画画，看见我爸爸高兴地喊，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们！我问，你们在干吗？爸爸说我要统计一下外面欠账。我说这点小事找蒙古就可以了。爸爸说他们算不清楚，还是你来吧！弟弟就对我喊，是爸爸说不清楚，他一会儿说人家欠他十块，一会

儿又说五十块。爸爸曲起中指弹了蒙古一下脑门，你们两个去给我买一包香烟去。掏出一张拾元的钞票放在桌子上，妹妹一把把钱抓在了手中，弟弟慢了一步。在对钱的敏感度上弟弟总是比不上小妹的。两个人吵闹着出去了。在我们家，给爸爸买烟是赚钱的机会。爸爸抽的是六块钱一包的烟，但是每次都给我们十块钱，多出来的钱就成跑腿费了，所以我们都把给爸爸买烟当做一桩美差。我坐在蒙古的位子上开始帮爸爸整理账目，他报个人名，再报出所欠的账目，我负责记录并将数字累计。随着数字的连续累加我开始疑惑了。是爸爸报出的数字让我疑惑：张三，两块，王知识八块，张四二十，刘五根，一百五，大柱子，五百七十三……没多一会儿，数字已经递增到两万多了。中途我多次打断爸爸问，你肯定别人欠你这么多钱吗？爸爸说那当然，这我能瞎说吗？可我还是不敢相信，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从来没有过这么一笔庞大数字的钱，妈妈以前常常为一毛钱甚至几分钱和卖菜的小贩计较，而且在农村的十多年中全家只有妈妈一个人在县城工作，工资也少，根本不可能挣到这么多钱的，而爸爸报出的数字还在增加，杨木匠，八块。老宋头，一万五。我一哆嗦，手中的笔叭地掉在了地上，刚要张口向他核实，妈妈回来了。还没进门就听见她在数落蒙古，你看你脏成什么样子了？你爸爸怎么也不管管你！爸爸一把将记录账目的纸抢了过去塞进了口袋，小声对我说，别跟你妈说这事。我点点头。再看爸爸，他脸色通红两眼亮得像灯一般，神情亢奋至极。

事后证实爸爸报的每一笔账目都真实存在。在乡村的最后半年他是在赌桌上滚打过来的，这些欠账都是在与当地人赌博中累积的数目。当时我们三个孩子跟着母亲在县城，只有他一个人在村子里，所以对他这半年取得的成绩浑然不觉，即使他主动说起全家也没一个人相信。全家人刚回到南京，新生活正一层一层地展开，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在各自面对的生活上：回南京后

不久妈妈就被国家安排进了一个单位。妈妈是个要强的人，工作上吃苦耐劳，生活中省吃俭用，一心想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日子过得出色起来。爸爸那时还在托人找工作，他的问题有点复杂，想找个挣钱的地方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不大容易，所以迟迟不能如愿。后来想想可能正是这种无法稀释的压力才导致了他内心的瓦解和崩溃。妹妹刚上二年级，乖巧聪明，是家里最省心的。弟弟则动辄和同学干仗，学校里的那帮孩子欺生，没事就逗他，他又是那种嘴拙性野的类型——乡野生活熏陶久了——话说不过人家就动手。城里的孩子人多势众，他们从没有单挑的观念，一打起来总是一拥而上，蒙古就常常被人家痛扁，每次吃亏了就来找我。这一阵我没少打架，多数是为蒙古。这也没办法，所有的一切都刚刚开始，你身上的优点和善良没人知道，你在向他们展示你的羽毛之前先得让他们认识你的粗鲁，否则你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向他们展示你的羽毛；我也相信电影上一句黑社会的语录，优雅是打出来的！那段时间全家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苦苦挣扎，对父亲身上的变化关注不够，所以出事后全家人一下就懵了。

出事那天爸爸来找过我。那天下午我们班正在操场上上着体育课，男同学们在玩球，女同学自由活动。体育老师单独把我叫到一边谈话。他告诉我两个月后市里有个学生运动会，他已经推荐我代表学校参加百米比赛了，要我好好准备。爸爸这时出现了，他背着一个大包，脚下穿着我的一双旅游鞋，手里拿着一顶帽子，远远地站在跑道边的一棵大树下朝我招手。体育老师问我，那人是谁？我说是我爸爸。体育老师看看他转脸对我说了一句，你爸爸挺精神的！我跑过去问，你怎么来了？爸爸说我要去外地挣一笔钱！我问，去哪里？父亲说不知道，也许是宿迁，也许是天津。我问，费事吗？爸爸笑着说，不费事，一两天的工夫。我问，能挣多少？父亲说，够我们家活个十年八年的不成

问题。我问，你有把握？父亲说：百分之百。问，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我说不行，我要上学呢！爸爸说你请几天假吧！我说不可以的。这边的课程跟宿迁的不一样，我有点跟不上。爸爸说上学是最没前途的，我劝你还是跟我走吧，拿到钱我们俩就到北京玩一趟。我有点动心了，北京我还没去过呢！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问他，你跟妈妈说了吗？我当时想只要妈妈让我和他去我就去，如果妈妈没说让我去我就不能去，否则我会被修理得很惨。爸爸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我没和你妈说。不过等我们把钱拿回来，你妈见到钱也不会说什么的。我啊地一声，说，你没和妈妈说你出去？爸爸耸耸肩膀。我说那我更不能去了。爸爸又劝了我一阵，看实在没戏就不再坚持，只对我说那好吧，你就好好上课吧。不过你得替我保守秘密，别告诉你妈我去外地了。这个要求在我们之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每次爸爸和我说什么事最后都要如此这般地叮嘱一番。我说没问题。爸爸说那我走了，我得赶车。我说你挣到钱就赶紧回来。爸爸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笑了笑，走了。走出两步后才把帽子扣上了脑袋。记忆中的胳膊长长的。

这个下午我有点莫名地兴奋，本来我对挣钱缺乏概念，觉得是一件特别艰辛的活儿，可看到爸爸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架势就由不得自己不相信了。这事看来是真的。我想。一想到过两天我们家将出现一笔巨款就禁不住心花怒放起来，甚至有点后悔没跟爸爸一起去，说不定还能从中分一点零花钱呢！

尽管答应不和妈妈说爸爸的事，但是晚上一回家被妈妈一问还是说了出来。后来想想爸爸的要求也不大现实，家里突然少了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搪塞过去呢？晚上吃饭时妈妈东看西看总觉得不对劲，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是家里少了一个人。她停下筷子问我们，你们爸爸呢？蒙古和小妹说我们放学回来就没看到他。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埋头吃饭。妈妈盯着我

看了一会儿,说你先别吃,告诉我,你爸爸呢?我正琢磨着如何搪塞,妈妈突然火了,筷子啪地往桌子一拍,你给我老实说!我就不敢编了,老老实实地说,爸挣钱去了。

母 亲

我无法准确把握任何与母亲相关的文字,每触及此类文字都备感吃力。我也没有关于母亲年轻时的记忆——这属于父亲私有。

你应该笑一笑。镜头里的母亲表情生硬,不像是在拍照,而是在完成一桩力所不及的工作。母亲的背后是一棵枇杷树,绿叶繁茂的枝头间结满了黄澄澄的枇杷。我利用观测镜观察着母亲,查看着她在生活中的姿态,轻松而惬意的一个下午。这种时刻在我和母亲之间并不太多,印象中的母亲始终在生活中忙忙碌碌,难得有停下的时候。镜头里的母亲于我和她之间习惯的距离稍远,人似乎比正常状态下缩小了许多,我的食指悬在快门按钮上,迟疑不决,生怕一指按下去镜头中的她就变成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甚至更小。是某种陌生的距离让我产生了一丝恐慌,我不停地把相机从眼前挪开,想确认一下母亲与我与生活之间的真实距离。我的恐慌影响到母亲,她以为自己有不恰当的装扮,屡屡垂头查究,脸上疑虑重重。等一下,我要换一双鞋。母亲终于发现自己是穿着一双拖鞋的。我说我不拍全身,不用换鞋。母亲不再坚持,但是脸上的神情依旧凝重。我说你放松点,这又不是拍电影。母亲嘴角努力地咧了咧。我说你还是太紧张了。她说算啦不拍了,你自己玩吧!摔脸就往家走。我没动,仍然在镜头中追着她的身影,母亲快上台阶时我张嘴喊了一声,妈妈!我忽然有点激动,声音像一根绷紧的琴弦在空气中微微颤动着,母亲吃惊地回头,我眼睛一闭使劲地摁下了快门,咔

嚓一声——

这是我一生中为自己母亲摄下的惟一一张照片。第二年枇杷成熟的五月我已经不在母亲身边了。那一年蒙古在一个下午爬到树上摘枇杷时从树上摔下来，断了一条胳膊……

父亲就这样离开了。两天过去了，然后又过去了两天，爸爸始终没有回来。一个星期之后，妈妈着急了——她并不关心是不是真有人欠爸爸钱——班也不上了，接下去的一个星期她领着我满南京地寻找爸爸，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家挨个跑了一圈，结果一无所获。在我们眼里妈妈跟爸爸平时的感情并不融洽。两个人动辄拌嘴吵架。也难怪，全家人一直靠妈妈的工资生活，爸爸因为自己的问题长期赋闲在家，这让要强的妈妈内心极度不平衡，两个人吵架时妈妈没少抱怨，总说如果哪天回家时看不到爸爸就好了。可爸爸一旦真不在家了她又慌得跟耗子似的，六神无主地在生活中团团打转。女人真是一个情感怪异的动物，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男人的，哪怕这个男人整天游手好闲什么都不做。

半个月的时间里爸爸的音信全无。妈妈已经快疯了。在所有的寻找没有结果之后，她果断地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那天夜里我已经和蒙古睡下了，半夜时妈妈叫醒了我。当时我正在做梦，一个飞翔的梦。我像一只鸟一样在生活中飞起来了。一片阳光托着我缓缓上升，速度飞快，风呼呼地刮过耳边，下面的景色在不断的疏远之中生长……天空突然晃动起来，身体在空中摇摇欲坠，飞翔和身体都如此的渺小和脆弱，我哇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妈妈说是我，别怕！别怕！扶着我躺下了。妈妈坐在床边，帮我掖好被子，哄婴儿似的轻轻拍着。做梦了？她问。我点点头。我问几点了？妈妈说两点多。我问，你怎么还不睡？妈妈说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我问

什么事。妈妈说这么让你爸爸在外面终究不是个事，我们还是应该把他找回来，她咬着牙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说我们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并没找到他。妈妈说他肯定在某个地方，我不相信他会去别的星球。我说，我们能怎么办？妈妈看着我说，照理应该我去找你爸的，但是我刚刚工作，你知道得到现在的这个工作很不容易，如果没了工作一家人的生活都成问题，而你弟弟妹妹年龄又小，抛下他们我也不放心，我想来想去只能让你代我出去找你爸爸了。我说可我要上学呢！妈妈说这也是让我为难的地方，如果让你去找人势必会耽误你的学业，但是你爸爸在外面生死不明我们又不能不找。我想来想去只有让你暂时牺牲一下了。如果不把你爸爸找回来我们一家人都不能安心的。看了我一眼她继续道，妈妈向你保证，这只是暂时的，等把你爸爸找回来你就可以继续上学了。你的成绩好，应该很快就能赶上去的。家里以后会尽量给你提供帮助，能考上大学就供你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就给你找个好工作。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蒙古突然从另一头坐起来大叫一声，我也要去找爸爸！妈妈被他吓了一跳，啪地打了他一下，你好好睡觉！

看起来这次妈妈是下了决心了。她为我即将展开的工作做了必要准备，其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行事作风于她从未见过。她向上海的舅舅借了三千块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说是为了方便我和家里联系。我觉得她是在进行一次赌博，她把赌注全部押在了我身上，让我担心的是赌赢当然皆大欢喜，可是如果输了怎么办？如果我把钱和手机全都花光了而最后没能找回爸爸怎么办？

在为我的出行做着准备的同时，妈妈还抽空领着我去了一趟学校，跟学校请假。学校对我们家的境况表示同情，很爽快地准了假。只有体育老师很是不甘，他把我拽到一边问我能不能等参加完运动会再走。我说这得问我妈妈，他又去问我妈妈，他

对我妈妈说,这次运动会很重要,你看能不能……妈妈说谢谢老师,但是孩子他爸爸现在生死不明,我们也没有心思去争取运动会上的名次。体育老师就没话了,他只叮嘱我,一找到人你就赶紧回来,我给你保留一个参赛名额。

早晨离开家的时候蒙古还在熟睡中。昨天他和我说了一晚上的话,很晚才睡着。临出门前我跑到妈妈的房间看了一眼小妹。她也没醒,妈妈已经为我烧好了早饭,想让我吃点东西再走,我没胃口。就走了。在我出门的一刹那,母亲眼泪哗地下来了,她用手绢按着眼睛,嘴里一个劲地说,你还是个孩子!你还是个孩子!

我径自去了火车站。这次出行目的地不明,我无法确定爸爸具体所处的位置,妈妈没有规定我的行程路线,她只让我在爸爸可能出现的地方找一找。“可能出现的地方”,如此含混不清的概念。这次出门带的东西并不多,除了必备的换洗衣物之外,妈妈还为我准备了一些常备药物,主要是治拉肚子和感冒发烧这一类药。除此之外就是一部手机和两千块钱了。这是我全部的家当。全部的家当都装在一个黄书包里。一个星期前书包里还装着课本作业本等学习用品,一个星期后已经被生活内容替代了。

我的第一站从哈尔滨开始。爸爸是哈尔滨人,他在那里还残存着一丝远亲近邻般的人脉关系,虽然平时联系稀松却也偶有通信。我们在农村时曾经有一个哈尔滨的亲戚寄过一笔钱给我们,爸爸那时常和我开玩笑,说等我长大了就带我回哈尔滨找个媳妇。在他看来全中国的女人就数哈尔滨的最出色。他说这话时口气贼大,好像他是哈尔滨市市长或者当地妇联主席似的,可惜我妈妈却不是哈尔滨人,仅此一点便让他的话打折不少。到了哈尔滨后我顺利找到了一个远房亲戚,在他的帮助下联系

上了所能联系到的一切可能的关系,但是没人见过爸爸,他们说自从爸爸十岁那年离开哈尔滨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我不甘心,又在哈尔滨滞留了数日,整天满大街的晃悠,指望在大街上能和爸爸不期而遇,但是结果令人失望,脚下的这座城市在时间中得过且过,种种迹象表明爸爸并没有来哈尔滨。确定这一点后我就离开了,随即去了山东烟台,然后又在安徽的芜湖逗留了数日。在芜湖时的最后一个下午我突然想家了。那天我坐在一家百货商场前宽大的台阶上,周围有一些乞丐,多是一些老人,他们破破烂烂地在向路过的行人乞讨。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追随着一对年轻恋人一路走过来,手里举着一枝玫瑰花,意图让这对恋人买下她的花,恋人却似乎没有这种打算,女的还不断地驱赶着小女孩,滚开!真是的!我听出来了,他们是南京人。南京人口头禅就是“真是的”!他们走过我身边时我用南京话向他们打招呼,你们是南京人吗?女的警惕地看了我一眼,男的则犹豫了一下,掏出一枚硬币扔在我的面前。我当时的模样一定让他们觉得我也是乞丐中的一员了。那枚硬币躺在我的脚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卖花的小女孩站在离硬币两步远的地方,眼睛紧紧盯着地上的硬币。我说,你想要吗?小女孩点头又摇头。我说你想要就拿去吧!她没动弹。我起身走了。

第二天我去了合肥。合肥是安徽的省会城市。这次出来我带了很厚的一卷“寻人启事”,是用A4复印纸打印好的,每到一座城市我都要在热闹的地段张贴几张。启事上除了爸爸的外貌特征的文字描绘之外还有一张爸爸戴着帽子的相片,剩下的就是我们家的地址和我的手机号码。手机自从买来之后一共只响过三次,全都来自妈妈,都是例行公事的询问,现在在哪里?你去过哪里?诸如此类。手机的铃声很特别,是一个老人的咳嗽声,一有电话过来手机就会咳两声,如果你不接它就一直咳下去。手机最后一次咳嗽是一个星期前,当时我在济南,那天上午

十点钟左右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南京这边爆发了流感。让我自己注意饮食和卫生,可能的话吃点大蒜什么的。那次之后手机就没再响过了。随着张贴出去的启事增多,内心对手机的期待也在不断增加,我相信留在身后城市里的启事总会有一份可能会被爸爸看见,只要他看见就一定会按照启事上的号码拨打电话的,那时就会有两声咳嗽从我的腰部发出——手机一直被别在我的皮带上。但是后来手机却再没响起过。我怀疑手机是不是坏了,有两次忍不住跑到公用电话亭用投币电话拨打自己的手机,直到手机咳嗽起来才放心。

我是早晨七点钟左右到的合肥。对于一个旅客而言,早晨七点是一个尴尬的时段,生活刚刚从睡眠中苏醒,整个城市都在洗漱中,景点还没开门,上班的人还要经过路途的过渡,被命运摆渡到此地的游客并不方便找个旅馆立刻睡觉。

出了火车站后我在附近溜达了一会儿,心想闲着也是闲着,就在火车站附近张贴起“寻人启事”来。我刚刚贴出了一张“寻人启事”,手机响了,咳咳。我掏出手机一看是南京的号码,应该是妈妈。现在是早晨七点多,妈妈这么早找我干什么?难道爸爸回家了?一念至此我的心咚咚咚急跳了数下,赶紧摁下了接听键。打电话的人却不是妈妈,是一个孩子,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是蒙古。我没好气地说,你给我打什么电话?接手机不要钱呀!蒙古在电话里怯生生地问,大林,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合肥,你有什么事情?蒙古说大林,家里出事了!我问怎么了?蒙古吞吞吐吐地说,家里来人了。我问,来什么人?蒙古说是一个……男……人。电话中的蒙古突然哭了起来。我说你哭什么,有什么事你说好了,哭个什么劲!真是的!蒙古还是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我问,妈妈在不在旁边?你让妈妈和我说话。蒙古说我是在学校附近打的电话,妈妈不让我给你打电话。大林你快回来吧!说完这句话电话突然断了,我回拨了多次也没

能再拨通。

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了，否则蒙古不会给我打电话的。我坐在街边的栏杆上犹豫了一会儿，决定回家，放下一切立刻回家。

三个多小时后我到了南京。出了火车站我直接去了蒙古的学校。我不知道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要先找蒙古问问情况。到了校门口时学校还没放学，我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后学生们陆续地出来了，叽叽喳喳的。蒙古夹在一群学生中，愁眉苦脸的。我大叫了一声蒙古！他一抬头，愣了一下，猛扑过来一把抱住了我。大林！大林！突然哭了起来。

事情比我料想的要复杂。据蒙古介绍，一个星期前家里来了一个瞎子，自称是爸爸的朋友，早年受过爸爸的帮助，现在生活好了专门来看看爸爸。妈妈就告诉他爸爸前一阵失踪了，现在生死不明。瞎子听说爸爸失踪显得很着急，一再安慰妈妈爸爸外面的朋友很多，不会出什么的，还主动要求留下来帮着寻找爸爸。就这样他在我家驻扎下来。我问蒙古，妈妈怎么会答应他留下的？蒙古说瞎子给了妈妈一笔钱。我说，瞎子好好的要给我们钱干吗？蒙古说：瞎子说早年爸爸帮助过他，他这次来就是为报答爸爸的，还说现在家里也需要用钱，让妈妈无论如何要收下。我又问，他在我家睡哪儿？蒙古说他和我一床。我稍稍放心了一些。

听蒙古的介绍加上自己判断，我预感到这个瞎子是个扎手的角色，他在我家能住下来就已经表明起码已经取得我妈妈的某种信任。这里面的问题在于，就算是为报恩也没必要非要住进恩人家里，真要报恩把钱给我们就可以了，没必要非得和我们一家同吃同住的。那么他赖在我家是什么企图呢？要钱，抑或是要取代父亲的角色？这两点对于我或者我们家而言都是极其危险的。在这里我不能荒谬地妄言什么如果他的目的是钱